

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美国与加拿大的比较

李其荣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武汉 430079)

[关键词] 新华侨华人; 美国; 加拿大; 职业结构

[摘要] 本文用人口社会学理论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影响因素。文章认为, 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应被视为新华侨华人。目前, 海外华侨华人约3500万, 美国华人有330万, 加拿大华裔有120万。美国和加拿大新增加的华人人口中, 新华侨华人约占2/3。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其中70%以上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移民基本上集中在西海岸地区, 从1970年开始, 华人集中而居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 区域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总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即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 新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也随之提高了很多。但是, 新华侨华人中贫富差别严重。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有: 美、加、中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放宽了对移民出入境的限制; 华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影响了其职业结构; 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也对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D634.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8)02-0072-08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 Comparison of the Case in the U. S. and in Canada

Li Qirong

(College of History &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Keywords: New Chinese Immigrants; the U. S.; Canada;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y of the Population Sociology. In this paper, the Chinese who entered into the U. S. and Canada in 1970s are regarded as the new immigrants. Generall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 S. and Canada since 1970s, that is, from physical type to intelligent type. Correspondingly, new Chinese immigrants' economic position increased as well, though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or and the rich are seriou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clude: relaxed restrictions on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for the adjustment of immigration policies of the U. S., Canada and China; the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change of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and labor market.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新华侨华人或新移民问题成为侨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 并取得了不少成果。美国和加拿大是新华侨华人最多的两个国家, 研究这两个国家的新侨华人, 对于了解侨情特点和发展趋势, 进而有目的地开展侨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近年来由于资料的缺乏, 学界关注美、加新华侨华人的职业构成与经

济地位的成果不多见, 更没有把这两个国家新华侨华人的职业和经济状况进行比较^[1], 只是有学者对美、加华裔新生代的特点作过社会调查和分析^[2], 因此, 深入研究美国、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新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促进中美、中加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 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 具有重要的理

*[收稿日期] 2007-12-29

[作者简介] 李其荣,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

*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加新华侨人比较——一种人口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批准号: QQB Y2007011)的阶段性成果。

论和现实意义。

一 对美、加新华侨华人的界定

新华侨华人也叫做新移民,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学界对新华侨华人有多种界定。一种意见认为,所谓新华侨华人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公民移居国外并取得永久居住权或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侨或华人^[3]。第二种意见主张华人新移民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移居的,华人新移民“来自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4]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我认为,美国、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应该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移居美国、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且在美国、加拿大取得永久居住权或加入当地国籍。

之所以把新华侨华人移居的时间确定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因为美国在1965年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即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这项法律被视为“自1924年移民法以来美国移民政策最重大也是最重要修改的法律”^[5]。1965年改革以前,“移民的大多数来自欧洲,1965年改革导致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比例都高,到1990年,到美国的85%的移民来自这两个地区。”^[6]麦礼谦教授也指出:“撤消对亚洲移民的限制,中国及其他亚洲太平洋国家每年的摊额可以高达2万名,华人移民与欧洲美洲各国移民享有相等的待遇。”^[7]按照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见,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有一些学者称这个新阶段为“信息时代”^[8]。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因而,在“后工业社会”进入美国的移民应该被视为新移民。

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是联邦政府于1971年建立框架的,承认加拿大人口的文化多样性,这个问题涉及种族、民族和族群来源、肤色和宗教^[9]。1971年,特鲁多总理在下议院讲话指出,现在应该改弦更张了,“要破除种族歧视的态度以及文化猜疑……(并且)形成一个以对各民族实行公平待遇为根据的社会基础”^[10]。也就在这一年,加拿大政府宣布实行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的政策。在多元文化政策下,欧洲移民比例下降,亚洲移民增多。1965年至2001年之间,到加拿大的欧洲移民从73%下降到10%。到2001年,大约有1600万移民来到加拿大,其中约有200万是在1991—2001十年期间移居的。这些移民的2/3来自亚洲,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巴基斯坦、韩国和菲律宾^[11]。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仅促进了加拿大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而且促进了华人社会的发展,也为日益多元化的世界树立了一个宽容、和谐与民族融合的榜样。

在这里,我们引证列宁对欧洲的老侨民和新侨民所做的界定,或许能为我们界定新华侨华人提供某种参照。列宁在《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中说:“1880年以前,大部分是来自古老文明国家英国、德国,一部分是瑞典的所谓老侨民。甚至1890年以前,英德侨民的总和一直超过侨民

总数的一半。从1880年起,东欧和南欧即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的所谓新侨民开始非常迅速地增多起来。”^[12]列宁在这里明确了三个意思:第一,以1890年为时间断线,1890年之前的移民为老侨民,1890年之后的移民为新侨民;第二,对移民来源地做了区分,老侨民来自西欧和北欧,新侨民则来自南欧和东欧;第三,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从世界各国得到了最刚毅、最能劳动的工人而日益迅速地向前发展。

有学者认为,中国从1978年实行开放政策,之后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因此,新移民的时间划分应从1978年算起。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时间上的区分有一定道理。但是,笔者觉得新老移民的区分,不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问题,还应看到移民输入国的国情。如果综合考虑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以20世纪70年代作为确定新华侨华人的时间标志比较合适。

二 美、加新华侨华人的人口规模与分布

美、加新华侨华人的人口规模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准确说法。这里有两个数字需要弄清楚,一是中国公民移居海外的人数,二是到美国、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人数。

美国学者达德利·波斯顿等人认为,截止到1990年时,分布在世界136个国家的华人有3700万人^[13]。国务院侨办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200万中国公民移居海外。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改革开放至1996年,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至少60万人^[14],其中留学人员占出国人数的比例较大。对各类留学人员的情况进行统计是教育部作为全国留学工作归口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我国开展留学与人才工作、进行国际教育交流的基础性工作。2006年度,以108个国家、126个我国驻外使(领)馆报回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主要留学去向国的驻华使馆、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国内有关留学服务机构提供的留学情况统计数据,并参考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和人事部门、国家有关部委及直属高校提供的留学统计数据和国内有关机构的留学信息报道等,教育部公布的统计结果如下:从1978年到2006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06.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7.5万人;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在外的留学人员有79.2万人,其中58.3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15]。

关于美国、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人数说法不一。蔡德奇、江永良认为,在海外华人口增长中,美洲华人口增长最快,由1950年的约29万增至2000年的约560万人(1990年约为280万人),其中70%以上又集中在北美的美、加两国。美国和加拿大经济发达,成为新华侨华人的主要流向地。美国1980年华人人口为80万人,1990年增至约160万人,目前则增至约300万,几乎每10年翻一番;增加的人口中有近2/3为新移民。加拿大的华人人数

20年来增长了约10万人,已超过100万,比美国的华人增长率高得多^[16]。赵和曼认为,1979—2001年美国的中国大陆移民(新华侨华人)总数有60-70万^[17]。朱慧玲认为,随着中美两国相关政策和国际大环境等的变化,美国华社人口由1973年的43万人激增到2004年的335万人^[18]。赵红英认为,大陆新移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美而且数量超过了半数以上,约有60万。美国现有华侨华人200多万,其中大陆新移民有30万。在加拿大80多万的华侨华人中,大陆移民就占了1/3,其中多数是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后移居加拿大的^[19]。

综合上述各位专家的意见,我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大约3500万,几乎遍布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20]。20世纪80年代,有73,000中国人移民到加拿大,345,000中国人移民到美国^[21]。根据权威的《美国移民百科全书》提供的资料,1990年美国华人达到165万人,其中69%是在国外出生的,31%是在美国出生的。国外出生的华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华人。中国移民中66%来自中国大陆,20%来自台湾、14%来自香港^[22]。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华裔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增加并成为最大的亚裔族群。1990—2000年间,华裔美国人增长48%,达到270万人,其中230万人为单华裔,另有40万人为华裔与其他族裔的混血人口^[23]。根据美国联邦普查局2007年3月1日最新公布的有关亚裔人口数据,美国华人有330万^[24]。根据2001年加拿大人口统计局的公布资料,加拿大华裔有120万^[25]。美国和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到底有多少?无法拿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但是根据各种研究,新增加的华人口中,新华侨华人约占2/3的说法比较可信。

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70%以上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26],其中40%居住在多伦多,32%居住在温哥华^[27]。

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移民基本上集中在西海岸地区,从1970年开始,华人集中而居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区域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在1970—1980年,居住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华人分别增长了10.3%和6.8%,远远高于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当然,这种分散化的趋势并未撼动华人高度集中于西部的传统格局。1990年,西部华人占全美华人的52.4%,东北部为27%,中西部和南部分别为8.1%和12.4%^[28]。由于历史的原因,当代美国华人大都居住在城市,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的移民在1991年主要居住在三个城市地区: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来自台北的移民有一点不同,他们选择居住在洛杉矶、纽约、圣约瑟。从某种程度来说,华人移民选择居住在城市,影响了移民流动和与此相伴的职业需求。台湾移民中掌握高技术的技术工人比例较高,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居住在洛杉矶和远离城市的郊外是因为能在高技术、航空工业和亚太企业中找到工作机会。来自中国大陆的许多人由于教育、工作经历、英语熟练程度等原因,蜂拥到纽约或旧金山,利用族群经济、族群网络去寻找工作机会^[29]。

根据2001年的统计,华裔最多的十个州依次是:加利福尼亚(980,642人)、纽约(424,774人)、得克萨斯(105,829人)、新泽西(100,355人)、马萨诸塞(84,392人)、伊利诺伊(76,725人)、华盛顿(59,914人)、夏威夷(56,600人)、宾夕法尼亚(50,650人)、马里兰(49,400人)^[30]。

三 美、加新华侨华人的职业构成

按照人口社会学理论,人口职业结构是指社会中人口职业分布状况,依据不同的标准可有不同的分类。第一,以就业状况分类,职业结构可分为在业人口和不在业人口。在业人口是指15及15周岁以上的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第二,以产业部门分布,职业结构可分为三种产业结构。第一产业为农业,第二产业为工业,第三产业为各种服务业。第三,依据各种产业部门的劳动分工,人口可分为更加具体化的职业结构^[31]。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日益多元,从事专门及科技类职业的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从美国新华侨华人职业构成特点来说,第一,战后美国华人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从事技术类的职业比例在不断上升。李小兵等人认为,“华人中从事专门及科技类职业的比例在1940年仅占有职业华人的2.5%,1950年占6.6%,到1960年上升为20.3%,1970年达26%,而到1980年则增加到30%。有不少从事各类专门、科技和文教工作的华人学者、专家、科学家和工程师成就突出,已成为美国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领域中的重要力量,有多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据1989年美国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华人中从事教育、科研、工程、医学和会计等的专业人员共有15万人,约占美国华人总数的20%。全美大约12万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中,华人占3万余人。”^[32]

第二,从产业部门分布来看,美国新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部门,且行业分布在不断变化。黄润龙认为,1989年,16岁及以上从事劳动生产的华人中,绝大多数工作于零售业(24.3%)、专业技术及相关服务行业(23.1%)和制造业(18.6%)。如果与同期当地居民相比,华人相对集中在餐饮业(15.1%:4.7%)、纺织成衣业(5.4%:1.6%)等行业。华人较少在建筑业(2.4%:6.2%)、农林渔业(0.4%:2.7%)。如果按产业划分,0.5%的华人工作在第一产业(当地居民为2.7%),21.2%和78.3%的美籍华人工作在第二、第三产业(当地居民为24.6%和72.8%)。如果与十年前相比,美国华人的行业分布有了一定的变动,1989年华人在服务业、批发销售业、保险金融业分别增加了1.7、1.4和1.4个百分点,而在零售业、制造业、公共管理部门减少了2.4、1.7和1.4个百分点。如果与同期美籍亚裔人相比,华人在农林业、建筑业、娱乐业比例最低,而在零售行业比例为最高^[33]。

第三,美国新华侨华人在科技、经济领域取得突出成

绩。赵红英总结了美国的华人新移民在教育、金融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她说, 1995年获美国总统教育奖的5位华人, 都是80年代后才从大陆迁居美国的。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有几十名大学教授是华人; 纽约华尔街有近200名新移民在金融机构工作。华尔街第二大投资银行的中国部主管、香港公司总经理就是80年代中期赴美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他被著名的金融杂志评选为全球50个最优秀的银行家之一。芝加哥摩托罗拉总部有400多名华侨华人新移民, 底特律公司汽车企业则雇佣了2000多名^[34]。

第四, 从具体职业结构来说, 美国新华侨华人从事管理、专业性工作比例超过美国人。美国官方公布的2004年美国社区调查的结果表明, 美国华裔职业分布如下: 51%从事管理及其它专业性工作(全美平均34.1%), 21.5%从事销售及办公室工作, 17%从事服务业工作, 7.8%从事生产、运输类工作, 2.6%从事建筑及维修工作, 0.1%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35]。

从加拿大新华侨华人职业构成特点来说, 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 不仅使华裔取得了平等的政治、社会地位, 还使华裔在职业选择上更加多样化, 在职业层级上也大有提高。与二战前华裔局限于族裔企业、服务领域相比, 多元文化政策颁行以后, 华裔在加拿大的从业领域更为广泛, 并且, 在管理、专职性工作、技术等高位职业领域, 华裔也有自己的阵地。黄昆章教授指出, 20世纪70年代以后, 加拿大华裔从事专业工作的越来越多, “70年代, 有2/5华人在销售部门和私人服务行业或服务行业的职业。20%华人属于白领阶层。进入八九十年代, 有更多华人从事专业性工作。”^[36]

王俊芳也认为, 华裔从事管理、办公室及专业工作的比例不断提升, 即从1971年的30%上升到1981年的41.2%。1981年和1991年调查数据显示, 在专职和其他白领行业, 华裔不再处于劣势状态。而在10年以前华裔在这些领域所占比重还非常低, 根本无法与其他加拿大人相比^[37]。

可见, 美国和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从事专门及科技类职业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华人从事的行业多元化是当今华人职业结构的发展趋势。由于北美华人移民的时间和基础不同, 所以华人的行业多元化也不同。如加拿大华人在全国各大城市开拓的商业、贸易、房地产和金融等现代经济领域, 带来了新的经济力量^[38]; 美国华人在科技和信息领域的作为颇引人注目。

四 美、加新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比较

华侨华人的职业构成多元, 而且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比例提升, 这带来了华侨、华人经济地位的提升、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目前, 美国全部华人年收入总额约为1000亿美元, 仅占美国国民年收入总额的1/75。但值得重视的是, 美、加华人经济发展极为迅速, 由原来的经营饮食、制农业转向

新兴产业, 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新移民的大量涌入, 华人在金融、房地产和高科技领域颇有建树。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 美国华资金融机构约有80多家, 资产总额在70亿美元以上; 加拿大华人金融机构约有70多家, 总资产约8000多万美元^[39]。

华侨、华人家庭经济状况与美国平均水平相比, 似略胜一筹, 但与美国印度裔相比则逊色不少。“1970年, 在美国做工的华人中56%是报酬比较高的白领职业。这一数字绝对高于美国做工人的一般情况。”^[40]美国联邦人口调查局2006年11月公布的2005年美国社区调查显示, 华裔作为全美最大的亚裔人口群体, 其家庭收入、人均收入都超过全美平均水平, 也超过白人、非洲族裔和西语的各项统计。家庭平均收入, 全美是4.6242万元, 华裔为5.9571万元, 印度裔为7.3575万元。平均个人收入, 全美平均2.5035万元, 华裔为2.9396万元, 印度裔3.3431万元。高薪职业状况, 全美从事管理、专业和技能工作的人口为34.1%, 华裔同比为53.9%, 印度裔为61.8%。贫困率, 全美是10.2%, 华裔9.9%, 印度裔6.1%^[41]。

另据2000年对亚裔各族群的社会经济状况调查, 华裔在家庭平均年收入和人均年均收入上比美国印度裔、菲律宾裔、日裔逊色。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李爱慧博士的文章《透视当代美国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4期)。

另外, 我们也看到, 华人群体的贫富差别明显。具体体现在: 第一, 从家庭收入来看, 华人表现出的贫富不均的特点是两头高、中间低。例如, 1989年华人家庭中年平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占4.46%, 而所有美国家庭中只有3.97%; 与此相对照, 华人家庭中年平均收入高于5万美元的达到40.74%, 而所有美国家庭中仅有29.98%。相比较来说, 华人家庭收入的贫富分化现象更为突出^[42]。在纽约, 24,745个华人家庭(占21%)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 而34,514个华人家庭(占30%)年收入不到2万美元。第二, 从地区差别来看, 美国西部华人的经济情况比东部普遍要好。加州等地方的华人受教育程度较高, 生活条件较好。加州有很长的华人移民历史, 又是华人人口最多的一个州, 当地的华人政策以及公共系统要比纽约完善。因此, 有人认为在美华人有一半处于贫困状态^[43]。第三, 从居住条件来看, 越来越多的华人跻身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 定居于以中产阶级白人为主的美国大城市的郊区, 享受着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 但很多华人, 尤其是那些靠亲戚资助来美的新移民, 仍然聚居于美国大城市中心的唐人街。而不少唐人街存在就业机会有限, 工作环境危险、不健康, 居住条件拥挤不堪、低于法定标准, 以及精神压抑等问题^[44]。

按职业性质, 加拿大华侨华人的经济收入大致可分为三类: 最上层的是富裕阶层, 他们经营房地产、金融、酒店、超级市场和大型现代化多元化工厂; 中层人员拥有一定资金, 自己开办中小型商店、餐馆, 从事会计、工程师、医生等职业的专业人员也属于此类人员; 下层指的是受雇

于别人的服务行业的人员、店员、餐馆工人以及各种工厂的工人等。有职业的华侨华人,受过18年教育者,1981年年均收入为1.8万加元,比犹太人和英国人低,但比黑人高,1988年的年均收入为2.4万元。据加拿大D.J.C市场调查公司研究员可罗汉1996年的调查,华侨华人家庭年均收入为4.7万加元,35%华侨以现金购买物业,68%拥有家庭电脑,33%有无线电话,37%有家庭卡拉OK,35%有传真机,20%投资于互惠基金会,25%有信用卡,25%有外汇户口^[45]。

家庭购买力反映了新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大多数加拿大华人,尤其是来自香港的华人,为许多行业提供了可观的市场潜力。尽管统计数据不一,估计1991年温哥华有华人119,300人,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为43,000加元,家庭的平均人数为4.3人,按70%用于消费计算,一年购买力为83,500万加元。据报道,1992年有35,797名香港人移民加拿大,这标志着为加拿大增加了11,000万加元的购买力^[46]。这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后,加拿大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说明华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了生活水平。

随着华人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华人的住房条件也超过了平均水平。据1981年统计,73%的华人拥有私人住房,而其他加拿大人只占70.5%。

必须指出的是,和过去相比,华人的地位的确提高了,势力壮大了。但是,应当承认,横向相比,华人的地位还不够高。几大城市的调查结果一致表明,华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最高,但相对收入与他们的教育水平不相称^[47]。

五 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

按照人口社会学的有关理论,人口、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因素影响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职业结构状况。“影响职业结构和流动的社会经济因素很多,包括收入水平、劳动力市场、就业条件、文化资本和社会网络等。”^[48]学界在分析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时各有侧重。李秀红在论述美国华人就业结构在二战后发生变化的原因时强调两点:第一,华人的文化素质相对提高;第二,1965年移民法的实施,使唐人街的民族经济焕发生机^[49]。黄昆章在论述加拿大华侨华人经济状况时则强调,华人口结构的改变使华人的职业发生显著变化^[50]。王俊芳在论述加拿大华裔职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时强调,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华裔在职业选择上更加多样化^[51]。其实,过于强调某一点,都失之偏颇。我认为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有四个:

第一,美、加、中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放宽了对中国公民出境和入境的限制。“美国对移民实行固定配额加类别优先制,加拿大对移民实行计分制,使移民数量和质量得到提高。”^[52]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允许学生和学者到国外学习,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更加放宽国民出国条件。“只要他们在外国有亲属又符合移民条件,中国政府一般都批准他们出境。中国和加拿大建交后,两国总理于1973年10月签订家庭团聚移民协定,

为一批中国有关居民移居加拿大提供了保证。”^[53]1976年中美建交后,中国人去美国定居的人数增加,当时中国派出到国外学习的学生320,000人,几乎一半去了美国^[54]。“特别是198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的颁布及随后有关细则的制定,简化了出国手续,为中国公民出国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极大地方便了中国公民的移居活动。”^[55]

由于美国《1965年移民法》将移民限额的分配原则建立在国籍基础之上,各国移民能够在平等条件下入境,因此该法案实施后,许多华人根据自身的条件,充分利用移民法中的各项条款,为寻求家庭团聚或谋求自身事业的发展,纷纷迁移美国,其规模呈迅速增长之势。据统计,在1961—1990年间,每10年华人移民入境人数分别为3.47万人、15.01万人和45.18万人。到1990年,在美华人总数达164.5万人,占美国人口的0.61%;到2000年,在美华人总数增加到285万,占总人口的1.02%。大批华人移民入境后,对美国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由1970年以前的以当地土生华人为主的社会逐渐转变为一个以外来移民为主的社会。2000年美国人口统计显示,外国出生华人占华人总数的70.9%,美国土生华人仅为29.1%^[56]。

加拿大政府战后调整了移民政策。1947年联邦政府废除了1923年禁止中国人入境的政策。尽管开始对中国人入境人数有所限制,但总的趋势越来越宽松。后来每年允许平均20万左右的世界各国移民入境,其中家庭团聚移民占很大比例。90年代放宽独立技术移民入境,这就为在各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到加拿大谋职创造了条件。加拿大为吸引外资,还鼓励商业移民,这就为许多香港和台湾商人到加拿大投资打开方便之门。

第二,华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这影响了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加两国的华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其一,祖籍结构多样化。二战前加拿大华人以祖籍中国广东四邑地区为主体,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后呈现多样化趋势,来自香港、中国大陆、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新移民日益增多^[57]。美国新华侨华人的来源地也起了变化。虽然广东人、福建人占多数这个传统的格局目前仍尚未改变,但是原籍地为其他省市的新移民则大量增多,包括来自广西、海南、湖北、上海、北京、天津、安徽、湖南、江苏、浙江、四川、河南、山东、云南、辽宁、山西、江西、东北、温州、苏州等地的华人。

其二,年龄结构年轻化。由于以家庭团聚名义入境的移民有不少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因而使华人口逐步年轻化。在加拿大,从1956年至1984年,入境的15岁至34岁者最多,占53.1%,这种趋势到90年代仍在持续。中国大陆来的移民都很年轻,60%在30岁以下,43%为15岁至29岁^[58]。周敏曾谈到,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口比美国的平均人口要年轻得多。197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第二代的华裔平均年龄低于14岁;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美国华人的第二代有44%在18岁以下,10%在18—24岁之间,而在美国华人的第一代只有8%在18岁以下,

8%在18-24岁之间。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在适龄就业(25-64岁)的口中,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占42%^[59]。留学生是新移民中的重要群体,他们不但学历高,而且年纪轻。据中国驻美国休斯顿领事馆对1000名留学生做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占90%。已毕业的留学人员主要分布在大学、科研机构、教育和卫生部门以及各企业的实验室、研究部、发展部等,以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技能从事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管理工作。”^[60]

其三,男女性别比例趋于平衡。20世纪前半叶,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子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1925年,男女的比例为13.7:1^[61];20世纪30年代,每年平均只有60名中国妇女进入美国;而仅1948年一年,便有3317名中国妇女移民美国;在从1944至1953年期间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中,妇女占82%。这样,华人中男女性别比例逐步从1940年的2.9:1,变为1950年的1.8:1,和1960年的1.3:1。1970年以后男女性别比例达到1.1:1;到1990年,男女性比例达到平衡^[62]。

加拿大华侨华人男女比例也趋于平衡。战前,由于中国移民以男性劳工为主,加以1923年后加拿大禁止中国妇女入境,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华侨男性比例高于女性。1921年有的地方如里贾纳、哈利法克斯的华侨男女比例为60:1。二战后,一批华侨妇女眷属得以移居加拿大。尤其是1956年后,入境的新移民总是妇女多于男子。例如,1956年至1967年男女比例为65:100,1968年至1976年为98:100,1977年至1984年为86:100^[63]。可见,加拿大华侨华人男女比例逐渐趋向平衡和合理。

第三,华人知识结构的变化。早期及二战前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移民大多数是农民或城市平民,文化水平较低,依靠体力劳动为生。二战以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这个情况得到改变,华人总体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当代美国华人新移民的社会经济背景各不相同。有一些人与老一代移民一样,来自农村,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很低,到美国时几乎是身无分文,因此他们为了生存下来,不得不从事低薪的体力工作。另一些人则带着家庭存款或雄厚的资金来到美国,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超过美国人的平均水平。“1990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成年移民有31%的人有大学文凭。”^[64]1980年至2000年,美国华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比全美国平均教育水平高出很多,技术水平也相对较高。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美国25岁以上的成年人口中,有大学四年本科学历以上的占24%,而华人占48%;美国16岁以上就业人口中,管理技术白领职位的占34%,而华人占52%^[65]。

加拿大华人文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对1981年15岁以上(含15岁)华人教育程度的调查表明,华人受过教育的平均年限为12.12年,而其他加拿大人为11.56年。大学毕业的华人占17.5%,高于其他加拿大人(7.9%),

未完成大学毕业的华人学生占11.3%,具有此两项文化水平的华人共计近30%,高于其他加拿大人的25.8%^[66]。

第四,劳动力市场对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双重劳动力市场,一个可称为高级劳动力市场(primary labor market),这是为管理层、技术层服务的市场,一般集中的是受过大学教育、具有技术或管理经验的人才。另一个是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这是一般劳动力市场,一般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工人多属于此类市场,这类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几乎没有机会进入管理阶层或高级劳动力市场^[67]。不论是美国华人还是加拿大华人,他们参与双重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一部分人从事管理、技术层服务;另一部分人为非技术工人,从事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

自1979年以来,中国有几十万人到西方国家进修和学习,其中到美国的人数占绝大多数,这批人已有相当一部分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而且很多人毕业后留在了美国。他们在美国从事科技、医学、商业、金融、法律、文化、教育等各种工作。1978—1994年间,大约10多万人获得硕士学位,80%从事理工科研究,除部分学成回国外,多数人在完成学业后仍留居在当地。1988—1996年间在美国取得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为16,500人,其中14,145人(约85.5%)计划留在美国,最后有7,935人(占总数的47.9%)最终落实留在了美国。这些高素质的华人大多进入美国大学及高科技部门工作^[68]。

有一部分新华侨华人具有职业技能,但是由于他们不懂英语,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不容易在美国发挥作用,而且他们缺乏有关大劳务市场的信息,从个人的人才资本得到承认的程度来说,他们开始时的地位只不过相当于城市底层的人,甚或还不如他们。他们在民族劳务市场里也缺乏竞争力^[69]。

总体来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应被视为新华侨华人。海外华侨华人大约3500万,其中美国华人有330万,加拿大华裔有120万。美国和加拿大新增加的华人人口中,新华侨华人约占2/3。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其中70%以上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移民基本上集中在西海岸地区,从1970年开始,华人集中而居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区域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70年代以来,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总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新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与过去老移民相比,提高了很多。但是,新华侨华人中贫富差别严重。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包括:美、加、中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放宽了对移民出境和入境限制;华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即祖籍结构多样化、年龄结构年轻化、男女性比趋于平衡,影响了其职业结构;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也对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注释】

- [1] 目前见到的反映美国、加拿大华人职业和经济情况的论文有：(1) 朱慧玲：《近三十年来美国华侨华人职业与经济状况的变化及其发展态势》，《八桂侨刊》2007年第1期；(2) 李爱慧：《透视当代美国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4期；(3) 李秀红：《二战后美国华人的就业特征及成因》，《求是学刊》2007年第1期；(4) 黄昆章：《二战后加拿大华人人口结构与经济概况》，《八桂侨刊》2001年第3期。这些成果对于我们研究本课题有参考价值，但它们不是专门谈新华侨华人的，更没有将美国、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的职业构成与经济地位进行比较。
- [2] 吴金平：《对美、加华裔新生代特点的社会调查及分析》，《世界民族》2004年第6期。
- [3]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赵红英、张秀明、赵和曼等人，见赵红英：《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张秀明：《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赵和曼：《美国新华侨华人》，《八桂侨刊》2003年第1期。
- [4] 曾少聪：《美国华人新移民与华人社会》，《世界民族》2005年第6期。
- [5] Franklin Odo, *The Columbi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sian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51.
- [6] Mary Jane Turner, Kenneth Switzer, Charlotte Redden, *American Govern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hio: Glencoe/McGraw-Hill, 1996, p. 154.
- [7] 美 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418页。
- [8] 李其荣：《华人新移民与后工业美国社会——兼论“模范少数族裔理论”》，《世界民族》2001年第3期。
- [9] Carl E. James, “Multiculturalism, Diversity, and Education in Canadian Context: The Search for an Inclusive Pedagogy”, cited in Carl A. Grant, Joy L. Lei, *Global Construction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1, p. 175.
- [10] 加 李胜生著，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第170页。转引自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
- [11] John Powell, *Encyclopedia of North American Immigratio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5, p. 47.
- [12] 列宁：《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列宁全集》第19卷，第454页。
- [13] Dudley L. Poston, Jr, Michael Xinxiang Mao and Mei-yu Yu,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round 199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0, No. 3 (Sep., 1994), p. 631.
- [14] 张秀明：《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 [15] 教育部公布 2006年度各类留学人员情况统计结果，http://liuxue.eol.cn/liu_xue_kuai_xun_3291/20070306/t20070306_221381.shtml
- [16] 蔡德奇、江永良：《海外华人地域分布变化特征及原因》，《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 [17] 赵和曼：《美国新华侨华人的若干变化》，《八桂侨刊》2003年第1期。
- [18] 朱慧玲：《近三十年来美国华侨华人职业与经济状况的变化及其发展态势》，《八桂侨刊》2007年第1期。
- [19] 赵红英：《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八桂侨刊》2001年第3期。
- [20] 乔研：《发挥侨办自身优势 实现“素质兴办——国务委员唐家璇视察国务院侨办”》，《侨务工作研究》2003年第3期。
- [21] Douglas S. Massey,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 166.
- [22] James Ciment,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New York: M. E. Shapen, Inc., 2001, Vol. 3, p. 1157.
- [23] U. S. Census Bureau, *The Population: 2000*, by Jessica S. Bames and Claudette E. Bennett, pp. 7 - 8. 引自陈奕平《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第42页。
- [24] 《全美华人 330万为亚裔之冠》，《侨务工作研究》2007年第2期。
- [25] 《华裔成为加拿大最大少数族裔》，《侨务工作研究》2003年第2期。
- [26] 赵红英：《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八桂侨刊》2001年第3期。
- [27] 王昶、梁晓：《温哥华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
- [28] 李秀红：《二战后美国华人的就业特征及成因》，《求是学刊》2007年第1期。
- [29] Benson Tong, *The Chinese American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0, p. 104.
- [30] “Chinese American Population Increase Reported”, *Chinese American Forum*, Jul 2001, Vol. 17 Issue 1, p. 7. 转引自陈奕平：《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 [31]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242 - 244页。
- [32] 美 李小兵等：《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6 - 118页。

- [33] 黄润龙:《海外移民和美籍华人》,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246页。
- [34] 赵红英:《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 [35] 朱慧玲:《近三十年来美国华侨华人职业与经济状况的变化及其发展态势》, 《八桂侨刊》2007年第1期。
- [36] 黄昆章:《二战后加拿大华人人口结构与经济概况》, 《八桂侨刊》2001年第3期。
- [37] 王俊芳:《加拿大华裔职业结构的变化》, 《职业时空》2007年第8期。
- [38] 陈传仁:《海外华人的力量》,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 第53页。
- [39] 刘劲松:《海外华人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国际论坛》2001年第2期。
- [40] 黄兆群:《美国的民族、种族和同性恋》, 东方出版社, 2007年, 第107页。
- [41] 朱慧玲:《近三十年来美国华侨华人职业与经济状况的变化及其发展态势》, 《八桂侨刊》2007年第1期。
- [42] 李爱慧:《透视当代美国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4期。
- [43] 朱慧玲:《近三十年来美国华侨华人职业与经济状况的变化及其发展态势》, 《八桂侨刊》2007年第1期。
- [44] 李爱慧:《透视当代美国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4期。
- [45] 吉隆坡《星洲日报》, 1997年8月25日。转引自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263页。
- [46] Wei - Na Lee, David K. Tse:《加拿大香港移民消费观转变之研究》, 黄静译, 载陈文寿主编《华侨华人新论》,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7年, 第227页。
- [47] 王昺:《文化马赛克:加拿大移民史》, 民族出版社2003年, 第393、397页。
- [48] 佟新:《人口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247页。
- [49] 李秀红:《二战后美国华人的就业特征及成因》, 《求是学刊》2007年第1期。
- [50] 黄昆章:《二战后加拿大华人人口结构与经济概况》, 《八桂侨刊》2001年第3期。
- [51] 王俊芳:《加拿大华裔职业结构的变化》, 《职业时空》2007年第8期。
- [52] 赵红英:《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 [53] 黄昆章:《二战后加拿大华人人口结构与经济概况》, 《八桂侨刊》2001年第3期。
- [54] Robyn Iredale,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03, p. 89.
- [55] 张秀明:《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 [56] 李秀红:《二战后美国华人的就业特征及成因》, 《求是学刊》2007年第1期。
- [57] 黄昆章:《二战后加拿大华人人口结构与经济概况》, 《八桂侨刊》2001年第3期。
- [58] 黄昆章:《二战后加拿大华人人口结构与经济概况》, 《八桂侨刊》2001年第3期。
- [59] 美 周敏:《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第8页, 第13页。
- [60] 程希:《当代中国留学生研究》,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年, 第53页。
- [61]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General of Immigr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Labor", 1925, pp. 22 - 23, cited in Xiaojian Zhao, *Rethinking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Family, and Community, 1940 - 1965*,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9.
- [62] Jan Lin, *Reconstructing Chinatown: Ethnic Enclave, Global Change*,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8, p. 26.
- [63] 加 李胜生著, 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 香港三联书店, 1992年, 第119页。转引自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247页。
- [64] Benson Tong, *The Chinese American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0, p. 105.
- [65] 美 周敏:《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第8页, 第13页。
- [66] 加 李胜生著, 宗力译《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 香港三联书店, 1992年, 第146页。转引自黄昆章:《二战后加拿大华人人口结构与经济概况》, 《八桂侨刊》2001年第3期。
- [67] 佟新:《人口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247 - 248页。
- [68] 李爱慧:《透视当代美国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4期。
- [69] 美 李小兵等:《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125 - 126页。

【责任编辑:郭又新】